

对话

最新出版长篇小说《隐身者》
马亿,一九九二年生于湖北黄冈,自由写作者。



重新找回写作者身份

唐诗人:马亿好,一转眼我们已经多年未见了,很愉快能在线上对谈。先从你的写作历程开始谈起吧。我记得你最初写过一些乡村、亲情题材的作品,比如《父亲的河流》《我的爸爸妈妈》等,你用了很先锋的艺术形式来讲这些故事,也给人耳目一新之感。传统题材加先锋技法,这是很多青年作家的起步方式,你觉得那一阶段的写作对你之后的创作进阶而言意味着什么?

马亿:诗人兄好,眨眼间我离开广州到北京也已经七八年,确实好久没见了。前段时间刷到一条短视频,说很久没见的朋友在彼此眼中,会一直保持他们上一次见面时的印象,不知道这一点对写作是不是也适用。你提到的这两篇小说,基本就是我的处女作,发表都是十年前的事了。现在再回想,那也许是一种所谓的写作训练,当时的我还完全没有生发出任何写作的意识和自觉,纯粹是出于某些莫名其妙、说不出来的原因,“自动”写出来的,是一种如婴儿般自由且无任何刻意的行为。要说那一阶段对我之后写作的影响,可能是在进行了诸多方向的写作试验后,除了写作技能的练习之外,我越来越发现和确定,我对书写现实比较感兴趣。

唐诗人:你在广州生活过很多年,我还记得你在荔湾芳村那边租住的房子,真是“广漂”的状态。后来去北京、回天津,其间你换了很多份工作。这些大城市的生活经验,直接改变了你的创作路径,后面写了很多城市题材小说,比如《都市人》《游荡者》,都让人印象深刻。《都市人》里你想象了三个人物,代表三种面对世界的精神姿态:反讽、无视与直接的咒骂,包括《游荡者》里的游荡者形象,都很有意思。可以说说这些年都市生活经历吗?这些经历如何影响了你的创作?

马亿:我在广州满打满算待



向人物内心更深处挖掘



了三年,就干了一份工作,住也只住过一个地方,就在荔湾那边。广州这三年,是我本科毕业踏进社会的第一步,这段日子看起来挺贫乏的,一直有一种无处不在的异乡人和漂泊感追随左右。一方面是在大学闲散四年后初入社会的无措,另一方面,我觉得广州日常的粤语环境会增强异地的感觉。在出版社的工作虽然安定,但心里还是漂浮着,找不到北。没记错的话,《都市人》是我来北京的第一年写的,其实刚到北京,还没有找到生活的状态,就写写城市里“奇怪”的人。《游荡者》不同,我个人把这篇小说当作一个具有节点意义的作品。当时,我从反复换工作的厌倦中跳脱出来,第一次辞职不工作,在北京的郊区租了房子专门写小说,这篇小说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写出来的。《游荡者》是一篇超过6万字的中篇小说,在此之前,我最长的小说都不超过2万字。经由《游荡者》的写作,至少当时的我,重新又找回了丢失的写作者身份。

2017年初,从广州到北京后,短短一年半内,我换了四五份工作。一方面是因

为文化领域类似公众号编辑、传媒公司的这类工作,在当时的北京确实有大把的选择机会。初到北京,经济压力骤然增大,时不时能碰到更高薪的工作职位,就赶紧跳槽了。从工作角度来说,这是种短视行为,来不及在工作岗位上积累就走了,这也是浮躁的一种外在表现



——读马亿小说

陈培浩

数字时代的小说家,或不为过。

马亿近年的作品,包括《游荡者》《理想人生》《莫兰迪展》《一号位》等,事实上都是沿着赛博现实主义的写作路径深入。这些作品确实敏感地将数字时代的生活经验吸纳为小说的背景、素材和叙事要素。比如,《游荡者》中的“非虚构写作计划”及其即时直播引发的流量狂潮和戏剧性风波,《莫兰迪展》中互联网“社畜”陈衡的颠倒人生,《一号位》中晨星集团的娱乐资本套路,都跟数字时代经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,让人感到扑面而来的当下气息。当代小说必须有充盈的当代经验,小说的价值就在于它必须有能力提供从日常、媒体等渠道难以获取的并不相同的当代经验,它不仅更具戏剧性或可读性,还必须更深入、更丰富,是对生活的重构、反观和反思。

马亿小说有意思之处也在此。马亿是一个具有很强思辨气质的小说家,他擅长讲故事,也深深知道,小说不仅是故事。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,当AI能够像模像样地讲故事的时候,人类小说家以何区别于AI呢?有人认为,AI没有具身经验,所以小说家应提供具身化的经验与情感;有人认为,AI没有历史意识,所以小说家应以历史意识去甄别和提供最具当代性的经验。这些都是道理。AI拥有任何人类个体所不能及的海量知识、工作效率,并拥有很高的叙事技能。这些无疑是创造杰出小说的重要条件,但还不是充分条件。小说需要思想,一种区别

于已然知识的思想。这种思想,作为执行性主体的AI就无法直接提供。AI有知识、有逻辑,有基于既往小说总结出的叙事算法,这足以快速生产出像模像样的小说,可是一旦涉入真正需要对当代经验做出甄别、需要对写作者的思想提出要求的写作深水区, AI很难有所作为。

什么是小说的思想?小说的思想既来自知识,又截然不同于已有的知识。一个小说家需要拥有丰富的知识,但在小说中过分展示和贩卖知识,很可能让读者反感。小说的思想体现为小说家对人情物理、时代经验、历史风云等的独特洞察和独到见解。小说家之笔需工于写人状事,惟妙惟肖,如在眼前;跌宕起伏,扣人心弦。这是小说家的常规本领,不过在讲故事的功夫之外,故事背后的人心勘探和世界丈量,就显出小说家的思想了。三流小说家讲故事,二流小说家刻画人心,一流小说家追问存在。这样说,并非说一流小说家不讲故事,也不刻画人心,而是说他进阶到了更高层次。所以,一流小说家,不能没有哲思的禀赋和追求。

作为青年小说家,马亿写作刚刚起步,却有一流小说家的追求。马亿的特点在于,他对数字时代的都市经验十分熟悉,并积极探索将其文学化的手段和路径。他又绝不止步于故事,拥有通过经验思索存在的思想冲动。《游荡者》中,他写“我”去追寻同为北漂艺术青年的失踪者张展的过程,以虚构的方式构造一个“非虚构”的过程,

说点是一辈子的事,时间拉长了看,一个写作者之所以能够成为写作者,更多还是跟性格底色和对创作的持续兴趣等关联更大。社会、时间以及各不相同的人生经历,自然会对每个具体的青年写作者进行分流。现实的力量是很强大的。

唐诗人:我注意到你已连续多年参与编辑出版漓江出版社的“中国年度悬疑小说”年选,刚刚还出版了你的第一部长篇悬疑小说《隐身者》。你对悬疑小说等类型文学很感兴趣吗?回想起来,你的作品其实也会使用一些悬疑笔法。借鉴悬疑叙事技巧进行纯文学创作的作家很多,悬疑技巧能够帮助作家讲故事,也容易吸引读者读下去,似乎也更容易获得影视转化。你未来的写作会有意向悬疑类型靠拢吗?

马亿:我对悬疑小说的兴趣,其实远早于成为所谓的青年作者、开始在文学期刊发表小说之前。在初高中刚开始喜欢阅读的时候,我就读过很多悬疑小说,爱伦·坡、阿加莎什么的,即使是后来我开始尝试写作,在文学期刊发表被归于纯文学这一类的小说,我也从未停止过阅读悬疑小说,像雷蒙德·钱德勒、松本清张,更年轻的尤奈斯博、东野圭吾,国内的紫金陈、那多、雷米等。阅读类型小说给人提供的感觉和释放,是那些被缠绕的结构和隐喻所包裹的纯文学小说所不能替代的。

我自己的写作,其实一直有一条不断断续续的“悬疑线”,早期的《杀人事件》《消失的食指》算是,后来这几年我又陆续写作发表了像《审判》《遗嘱》等,2025年还发表了《目击者》,我的第一本悬疑小说集也已经跟出版社签约。除了这部小说集和刚面世的长篇小说《隐身者》外,我还应约创作了一套儿童系列探案故事,预计今年出版。这算是我送给我正在上幼儿园的儿子的一份礼物。成为一名父亲后,很多想法都会发生转变。这一点,我相信你也有很深的体会。

除创作之外,我之前的几份工作,其实都跟悬疑小说的影视化有非常密切的联系,跟国内很多悬疑作家和从业者都是朋友。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,我才会参与到“中国年度悬疑小说”的编辑和出版工作里。我渴望看到悬疑小说在中国文学领域最新的种种尝试。

最后的这个问题,如果有可能的话,假以时日,也许我会成为一名纯粹的悬疑作家,专门写作类型小说,谁知道呢?

唐诗人:我刚读完你的《隐身者》,虽能看到一些纯文学的痕迹,但它已经是一部相当纯粹的悬疑小说了。对于纯文学写作者转型类型文学创作,我们都习惯于跨界叙事、类型融合等维度来讨论。但对于《隐身者》,可以忽略它背后的“传统文学”因素,它就是一部社会派推理悬疑小说。对人性的拷问、对社会问题的揭露与反思、对正义的探寻,这些都是悬疑小说自身的特质。我一直认为,文学作品的高下优劣,与作品属于何种文体类型并无关系,只在于叙事艺术的精湛程度以及精神思想的境界层次。优秀的作品是超越类型的。期待你能成为兼顾多种文体类型的多面手,超越类型意识,创造属于自己的文体类型。

(唐诗人系暨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)

这是意味深长的。小说既融入侦探元素,又加入跨文体的尝试,包含了对数字流量时代文化症候的审视。不过,小说最令人触动的还是故事背后的东西。马亿的小说何以在故事背后有东西?因为他总是用哲思的关切打量世界。他看失踪摄影师张展,时刻萦怀的是生命的意义;小说人物在辞职后,会说出“从今天起,我重新拥有了我的生命”这样的话。这里的区别和差异,不是修辞上的,而是生命观层面上的。小说对摄影和写作也有本体意义的思索,所以,小说中会有写作“是‘就是’,而不是‘是’”这样看似绕开、实则颇具哲理的表达,也大段引述费尔巴哈的话:“我们的时代偏爱图像而不信实物,偏爱复制本而忽视原稿,偏爱表现而不顾现实,喜欢表象甚于存在。”这些话跟小说情节并无直接关系,但正是它们引导我们将张展失踪作为需要思索的对象,而非简单接受下来的现实事件。在数字时代的算法和流量法则中,张展是谁?有何思想?这些并不重要。重要的张展及其符号提供的可消费性。马亿一面展示着数字消费社会将一切化为景观泡沫的过程,一面又以深沉幽微的批判缅怀着本雅明“小说的诞生地乃是离群索居之人”的现代艺术观。

我愿称马亿为数字时代的小说家,不是因为他已经取得了多大成就,而是因为他置身于数字时代的生存规定性中,却始终冥想着数字之“有”之上的存在之“无”。小说家必须是穿行于有无之间的人。

(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)